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商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商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9

ISBN 7-80155-149-4

I. 1.1… II. ①中… ②中… III. 商业经济-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IV.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752 号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商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

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8 字数:987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5-149-4/F·115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18.00 元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薛暮桥
主 编 刘国光 王 刚 沈正乐
副主编 董志凯 (常务) 陈廷煊
刘美玲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刚 刘国光 刘美玲
匡家在 沈正乐 陈廷煊
易全金 武 力 赵学军
赵增延 徐建青 剧锦文
董志凯

总 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磨炼，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 50 周年，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抚今追昔，总结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们面临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深化改革，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仅要学习国内外一切先进的思想理论、管理经验、科学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将其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历史使命越来越迫切地摆在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面前。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谙熟国情，了解自己，系统地、深入地、有创见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科学地总结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则是必要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就是为全面地完整地回顾与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奠基和铺石。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一起，查阅了数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八载才编辑成的。全套丛书包含 12 卷，内容达千万字以上，于 1996 年底全部出齐。该《选编》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的详尽的学术资料，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此套丛书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批有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预计还会有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 1953—1957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1953—1957 年，我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主要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严重不足的重重困难，进行了以 156 项为中心的 700 余项重大工程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兴旺局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与此同时，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逐步确立。1956 年中共八大前后，党和国家又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均对三大改造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变革的意见。当时的历史条件（国际的敌视、孤立与封锁，国内生产要素匮乏，产业结构失衡，缺乏经验等）形成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尚需服务于新生政权的建设，服务于建立强大的国防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特殊目的决定了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置于首位，并且实行以行政命令为主体的计划管理体制。时过境迁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也有曲折

与教训。对其间“三大改造”等重大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然而，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理论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本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将披露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于真理的辩证和理论的发展必然产生推动作用。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1949—1952年部分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毋使遗漏，并且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立卷次，详列纲目，按类编排成书；在编排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和逻辑的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而且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这部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国务院、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1998年1月

凡 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1949—1952）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二批为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53—1957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计划、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工资等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Ⅹ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为确保材料精炼，增加信息

容量，对档案资料大部采用节录、摘录处理。凡采用主要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凡局部采用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 [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号。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 [] 号；凡为遗漏字，在该字后面加 [?] 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1955年3月1日我国币值改变前的资料中的货币单位为旧币，10 000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改变后的1元。本书中的货币单位维持档案资料原貌，请读者注意资料形成日期，加以分辨。

十、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档案资料出处以字母和数码代之。字母为档案资料保存单位，数字为档案资料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各卷并附相关《要事年表》。

前 言

徐建青

本卷编辑的是 1953 年到 1957 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关商业方面的档案资料。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施，对商业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周恩来在 1953 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提出，商业工作的任务是：从扩大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稳定市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和合理利润，为国家积累资金，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逐步保证人民需要和巩固工农联盟。同时，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乡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这一时期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发生了重大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时期的商业工作是在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修正错误，调整政策的过程中，一波三折地走过来的。这一时期的商业为保证“一五”计划的完成作出了努力，同时也在组织、制度等方面加强了自身建设，初步奠定了此后商业工作的基础。

(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内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从供求方面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 1953 年开始，国内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紧缺、

供不应求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布、油脂油料、肉类、日用消费品等，私商争购，物价不稳。这种情况从现象上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后，市场渐趋平稳，而“三反”、“五反”后市场一度萧条，商品暂时积压，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部门盲目乐观，提出压缩库存，挤出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错误措施，造成1953年上半年一些商品脱销的紧张局面。这一做法到1953年下半年被纠正。二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增加了社会就业量和工资总额，农村中农业增产，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乡人民的购买力迅速增长；国家为了增加出口以换取工业化建设需要的设备和物资，也需要掌握更多的农副产品，从而减少了国内市场的供给。从根本上说，产生这种物资紧张的局面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增长赶不上工业化建设和出口的需要。从1953年下半年起，这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开始被逐渐认识，并提出这种市场特点和趋势将是长期的，从而导致一系列商业政策的制定。

第二，1955年以后，农业合作化进程加快，1956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组织起来的农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农村市场在商品需求结构和需求量方面的深刻变化。农民注重打井、积肥、兴修水利，农村对新式农具、运输工具、水利工具、农药和农药机械、大牲畜等生产资料的需求突破了常规。在日用工业品方面，妇女参加劳动后对缝纫机、儿童玩具等的需要量增加；适应阴雨天出工需要，球鞋、胶鞋、雨伞、雨帽的需要量增加；农业社需要计时，引起闹钟、挂钟的需要量增加，等等。在文化用品方面，农业社记账、组织体育活动、开展扫盲运动等，使得算盘、钢笔、皮头铅笔、尺子、记工簿、记账簿、笔记本、墨水、油印机、油墨、复写纸、蜡纸、扑克牌等商品的需要量不断增加。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诸如肥皂、竹壳热水瓶、棉袜、卫生衫裤、自行车等当时比较高档的商

品也有了市场。一些原来不销往农村的商品成了畅销货。在购买方式上，由个体农民分散购买变成农业社集体购买。在商业网点布置上，农民为了减少误工时间，要求就近能买到商品。商品的淡旺季节规律也有变化。商业部门起初没有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遵循旧例进货销货，造成有的商品积压而有的商品脱销。因此，安排农村市场成为这一时期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一项重要工作。

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证供给，稳定市场，促进生产。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商业部门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调查工作，以求了解历史上的以及现实的商业状况，掌握商品供求规律，在市场上取得主动。例如，1953年到1954年，由各专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社会购买力、公私比重、居民需要的调查，时段从战前到解放后，要求弄清各种商品的产销存数量、品种、价格包括批零价格及各种差价比价情况；1955年在全国城乡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私营商业、饮食业的普查；1956年五金机械公司在各大城市进行了资本主义五金商业史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调查；1956年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各民族社会经济基本状况、民族特殊商品需求状况的调查；1956年对全国农村市场需求状况和商业网的调查；1957年在针棉织品、百货、文化用品、交电器材、五金机械、化工原料、烟酒等行业中对主要商品进行的价格调查；1957年对农村土产、耕畜进行的历史上流转时间、路线、市场网点状况的调查，等等。这些以认真的态度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调查为进一步了解国情、开展商业工作积累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

(二)

“一五”时期流通领域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对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了统购统销。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需求供应，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国家

采取了对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政策。其中包括 1953 年对粮食、油料油脂实行统购统销，1954 年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对生猪从派养派购到实行预购。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里，农业连年增产，1952 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时粮食问题虽没有根本解决，但至少到 1953 年初并未突出显现粮食紧张局势。当时国家的粮食来源一是征缴公粮，一是从市场收购。为了能有稳定的粮食来源，曾设想从 1952 年起采取向农民征购的办法，但实际并未实行。1953 年一季度以后粮食局势日益紧张，有关部门曾提出统购的办法，但中央为慎重起见而没有批准。在此期间从上到下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直到 1953 年 10 月，中财委召开粮食紧急会议，陈云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种方案权衡利弊的发言，经过反复掂量斟酌，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并不顺利，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人另外提出了通过预购、市场收购、征收公粮几种措施结合的解决方法。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心有抵触。对此，国家采取通过忆苦、算账、大辩论的社会主义教育办法来打通思想。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匆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一时间人心浮动，秩序较乱。因此，在 1953 年粮食统购工作结束后，政府即着手进行购销方面的制度建设。这一工作直到 1955 年以后才基本走上轨道，在城镇从按户凭本供应到按人发放粮票供应，在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对各种特殊用粮制定供应办法，以后粮食工作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备，直到 1985 年取消粮食统购统销，这一制度一直实行了 32 年。粮食统购统销保证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国家对粮食的基本需求，这一个时期里稳定了粮食局势。

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主要农产品的大部分退出了自由

市场。国家对市场实行严格管理。禁止私商经营统购统销物资，对原来经营粮、油、棉布的批发商和零售商进行转业安排。到1954年底，私营商业基本被排除出了这些市场。

(三)

“一五”时期商业工作计划性逐步形成并加强，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关系逐步理清。另一方面，在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这一时期国家曾试图利用市场机制，建立一种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为补充的体制。

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在历史上有三次分工，都是发生在“一五”时期。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二者之间没有明确分工。在城镇中，国营商业与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同时存在，共同经营一些商品，难免相互发生矛盾；而在农村，国营商业无力顾及，供销合作社力量薄弱。1953年12月，商业部与全国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划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对工业品、手工业品经营范围的共同决定》，确定按经营对象即按商品进行分工的原则。1954年7月，中财委下达《关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城乡初步分工的决定》，对二者在经营地区上进行了划分。在1955年4、5月间同时召开的商业部全国商业组织工作会议和供销合作总社全国供应采购业务会议上，两个部门共同商定了国、合商业在批发业务上实行“商品分工与地区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同时，根据第二、三次分工的原则，城市消费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经过三次分工，初步理清了国、合商业的关系，也有助于加强对国、合商业的计划管理。

在对商品购销、物价等方面调查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商业工作在商品流通管理、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计划性开始形成。如对商品、市场的分级分类管理，对商品的计划分配，对某些小商品的生产的计划安排，对物价掌握的权限及分工，都开始逐步形成制度。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五”时期并没有完成。但这一时期为此后

商业工作的计划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商业企业管理方面，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实行的“大回笼”的贸易金库制度已不能适应商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1952年底提出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1953年在几个地区的百货行业进行了试点，随后逐步在各行业推行。在组织机构上，开始建立各级批发站；在企业管理上，国营商业企业开始建立财务、统计制度，核定资金，实行独立核算。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改进管理，降低成本、费用，提高利润率。经济核算制的推行历经了较长过程，到1955年底，省级企业单位全部核定资金，实行独立核算，专县级单位已核资并独立核算的占40%，未核资及未独立核算的占60%。按照部署到1957年将经济核算制全面推行到县。

在加强计划领导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国家曾设想建立一个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为补充的经济体制。这种设想产生的原因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基本国情外，大约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后，关闭了农村自由市场，农民手中的余粮及其他农副产品没有了交换渠道，农村市场曾一度萧条，同时也阻碍了城乡交流，农民无力购买工业品，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不足，造成城乡关系紧张；再一个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些在改造期间所采用的强制性的缺乏自由度的方法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没有竞争，产品质量下降，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生产与扩大流通的要求。当时的作法与设想主要有：建立由国家领导的没有私商参加的国家粮食市场；开放农副土特产品自由市场；改变工商企业间的关系，由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变为工厂自销、商业部门选购。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作想法在这一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实现。到1957年秋季以后，国家粮食市场被关闭，改变工商企业间关系的设想未付诸实践，只有农产品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被保留。

“一五”时期由于商品供不应求状况及开放自由市场，在市

场物价方面实行了“稳定物价，个别调整”的基本方针。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对过去存在的和由于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个别的局部的调整。在这一时期，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如生猪、油料的收购价格。到1957年，以1952年为100，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122.4，同时期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1.6。在确定各种差价政策上，本着有利于计划生产的发展、便于城乡物资交流、贯彻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保障人民生活的原则，调整了一部分产品的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并针对部门工业品质量下降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产品质量差价，制定了相应的按质分等论价的原则。这一时期，由于主要农产品已由国家统一经营，季节差价被认为已失去作用，因而取消了主要农产品的季节差价。“一五”时期基本保持了物价的稳定，物价总指数以1952年为100，1957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为108.6，保证了国家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四)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恢复时期已经开始，当时主要是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到1952年底，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在主要商品批发经营中已占统治地位，私营商业批发额约占36%。1952年，私营商业零售额比重约为65%，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形式的商业不到1%。“一五”时期，对私营商业的改造逐步深入，步伐加快，195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

按照城乡分工的原则，对城市和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分别由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来领导。这一时期对私营商业的改造经历了两个阶段：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基本排除私营批发商，实际到1954年，私营商业批发比重已下降为11%，到1955年8月，私营商业批发比重进一步下降为4.4%。在主要商品经营中